

A HISTORY OF
WESTERN HISTORIOGRAPHY

主 编 张广智

本卷作者 周 兵 张广智 张广勇



西方史学通史

第六卷 现当代时期

19世纪末至今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 Present

复旦大学出版社

西方史学通史

第六卷 现当代时期

19世纪末至今

The End of 19th Century ~ Present

主 编 张广智

本卷作者 周 兵 张广智 张广勇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西方史学通史 第六卷 现当代时期/张广智主编;周兵、
张广智、张广勇著.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11. 12
ISBN 978-7-309-08420-7

I. 西… II. ①周…②张…③张… III. 史学史-西方国家-现当代
IV. K09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 182251 号

西方史学通史 第六卷 现当代时期
张广智 主编 周 兵 张广智 张广勇 著
责任编辑/史立丽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2.25 字数 346 千
2011 年 12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8420-7/K·351
定价: 4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导 论

20 世纪已向我们告别,成为历史,成为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了。的确,20 世纪是一个史无前例的大变革时代,它的行程,激烈动荡,曲折坎坷,称之为天翻地覆,并不为过。当代英国马克思主义史家艾瑞克·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曾这样描述:20 世纪是在全球动荡不安中落下帷幕,世纪末的人类,只好在弥漫全球的一片迷雾中摸索前行,透着朦胧的足音,跌撞入第三个千年纪元的开始^①。

这是出自西方史家对 20 世纪行程归纳的一种声音,姑妄听之。“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回顾与总结 20 世纪的世界史,将有益于人类在新世纪的前行。于是,了解与认识 20 世纪的西方史学及其走向,也成了史学工作者尤其是西方史学史家的题中应有之义。

众所周知,在世界史学史上,西方史学也有其源远流长的历史,从古迄今也经历了 2500 多年的历史进程。行至 20 世纪,西方史学更是发生了深刻的变革,这种变革溯源与蕴藏于西方史学的传统中,又对今后的史学发生着深刻的影响。为了让读者了解与认识现当代西方史学的历史进程,这里有必要对西方史学,主要是 19 世纪末以来的发展变化之大势^②,作一简述。

一、流程: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

就其大势而言,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这是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总

① 参见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1914—1991》(下册),郑明萱译,江苏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版,第 828 页。

② 严格说来,本卷从史学史角度的分期来看,或可从 19 世纪末新旧史学之争开始,迄至 21 世纪的第一个十年。但 20 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变化或可大体涵盖“现当代卷”的内容。从时间概念上来说,本卷大体把 20 世纪与现当代画等号。对此,另见下文第三节。

的走向。笔者想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解读这句话。

第一,从西方史学所经历的五次转折来看。

现当代的西方史学,流派纷起,诸说风行,史家辈出,佳作成林,呈现出一派互争雄长与此消彼长的多元格局,如同儿童手中的玩物万花筒那样,精彩纷呈。然而,现当代西方史学的壮观不是朝夕形成的,它当然是历史的延续,就是说,它也是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而发展起来的。在这里,笔者用“五次转折说”来概括这一行程。

第一次转折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左右。古希腊的神话和史诗,蕴含了先民历史意识的最初萌芽,社会的进步促使神话色彩日益淡化,多彩的世俗生活取代了浪漫的神仙世界,从神走向人,呼唤西方“史学之父”希罗多德的诞生,不管怎么说,他的传世名篇《历史》终究是一部“人曲”,批判方法的初步运用,记叙体史书的奠定,在西方史学史的路标上写下了最初的文字:西方史学的创立。

第二次转折发生在公元5世纪前后。西罗马帝国的崩溃,激起了广泛的历史回响,初兴的基督教因而在帝国境内蔓延,圣奥古斯丁以他的《上帝之城》,不仅对风雨飘摇与多事之秋的罗马世界作出了回应,而且由此也开创了基督教史学的新天地。经过重新构建的基督教历史观念,颠覆了古典史学(希腊罗马史学),支配了西方中世纪史学的历史进程,并对后世发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三次转折发生在西欧文艺复兴运动发轫的年代。大约从14世纪以来,文艺复兴运动之火由意大利发端,终在西欧大地燎原,人文主义思潮弥漫,历史给其时的人文主义史家一项任务,那就是如柯林武德在《历史的观念》中所言,“史学思想又一次把人放在它的画面上的中心地位”^①,在他们高扬的史学旗帜上,人们看到一个大写的字:人。

第四次转折发生在19世纪末。在西方,19世纪被誉为“历史学世纪”,而这个世纪中的“皇冠”,戴到了德国史学大师兰克的头上,但独霸史坛的兰克及其学派终由巅峰落下,至19世纪末发生了德国“新史学派”与以兰克史学为代表的传统史学的论争,“新史学派”的代言人兰普勒希特成了从西方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最早的一座桥梁,在桥的这一头是西方传统史学,在桥的那一头是西方新史学。从那时开始,就迈出了现当代西方史学的行程。

① 柯林武德:《历史的观念》,何兆武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页。

第五次转折,发生在20世纪50年代前后。在20世纪上半叶,新史学如同冰层下的激流,正在蓄势待发,而此时传统史学仍有雄厚的实力。不过,这一情况到了二战后,尤其是到了50年代前后,西方史学发生了急遽的变化,新史学在60—70年代,发展到了它的全盛时期,至70年代以后,西方新史学又发生了若干新的变化,于是不断出现“结构性调整”、“转型”,新的力量又出现了,对新史学的挑战也更激烈了,比如后现代主义史学。

由上述西方史学“五次转折说”,可知史学的新陈代谢同大千世界一样,也是不可抗拒的,史学的传承离不开变革,它是史学发展的源头活水,使史学永葆强劲的生命力,因而史学的转折也就应运而生了。

第二,从现当代世界史学的三股主要势力来看。

纵览现当代的世界史学,概括地说来,主要有以下三股势力(或史学流派),这就是:西方新史学,从阶级属性而言,即为现当代的西方资产阶级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这里主要说的是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以及50—60年代追随前者而在中国新时期仍勃发的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西方传统史学,即沿着从古典史学到近代西方史学路数而延伸至20世纪的西方旧(或传统)史学,而这主要又是指兰克学派。

一般说来,上述这三股势力的角逐,由此推动了现当代国际史学的前行。不过,这三股势力的博弈,不是像中国古代魏、蜀、吴争斗,最终形成了三足鼎立的“三国时代”。现当代的世界史学没有“三国时代”。因此,对这三股势力的流向及表现还得作点具体分析。

西方新史学的概况已如上述。需要稍作补充的一点是,它在20世纪上半叶还很弱小,还处在马克思主义史学与西方传统史学的“夹击”之中,但它毕竟有后劲,越是这样,就越加发展。一方面,它很聪明地回应了仍有强大实力的传统史学,在创建新史学的同时,又不忘继承传统史学优秀的史学遗产;另一方面又理智地与马克思主义史学接近,从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至二战结束,两者在逐渐消弭对立状态,至二战后,更从彼此接近到进行心平气和的对话了。

在现当代的世界史学中,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曾拥有过举足轻重的地位,无论对西方史学还是对我国史学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就后一点而言,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对我们,并不全是负面的,也有不少积极的东西,这就需要对它的史学发展史作出认真的总结,以吸取其经验教训,虽则这个国家已解体,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作为一份遗产,是不可能随之消

失的。笔者曾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沉浮》一文^①中说过这样一段较为形象的话,也许对了解与认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衰有点帮助,大意是:史学的成长与发展,需要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但是,在苏维埃的国土里,老是阴晴不定,冷暖失常,更兼几番疾风骤雨,摧落花枝凋零,遑论于风雨憔悴中煮字烹文。多年来,那里的历史学家正是在这种“阴晴不定,冷暖失常”的环境中,备受折磨,艰难生存,苦苦地在寻求历史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自身价值和自身地位,痛苦地挣扎,坎坷地前行。这种教训难道不应为我们所吸取吗?

至于说到西方传统史学,它行之有年,垂垂老矣,似乎总该退出史坛吧?然而,20世纪的西方史学发展史证实,老树发新枝,不仅在20世纪上半叶它仍呈现出强大的活力,卷帙浩繁的“剑桥三史”问世(即《剑桥古代史》、《剑桥中世纪史》和《剑桥近代史》),是为显例,即使到了20世纪下半叶,甚至在新史学运动蓬勃发展的美国,仍有像恪守传统史学的“顽固分子”,如希梅尔法布(Gertruder Himmelfarb)之辈,在1988年美国历史协会的年会上,“短兵相接”向新史学发起了正面的交锋。其实,从史学发展的关联性而言,西方新史学总是跟传统史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比如法国年鉴新史学派总是深深地扎根于法兰西的史学传统之中。

然而,时代毕竟不同了,真是“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西方新史学揖别了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又携手经过革新的传统史学,终而成了“霸主”。试看今日之史坛,竟是谁家之天下?答曰:现当代西方新史学。不管人们承认与否,能引领当代史学潮流者,非西方新史学莫属。

第三,从西方史学发展中心的国别转移来看。

西方史学的发展,迈入近代门槛以来,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史学发展中心。从国别来看,大体说来,可以作如下的描述:文艺复兴运动最先在意大利发生,因此近代早期的西方史学中心在意大利,尤其以16世纪前后的佛罗伦萨史学为其发源地,马基雅维利和圭恰迪尼都是生活在这一时代、这一地区的著名的人文主义历史学家。大概到了17世纪,西方史学的发展中心逐渐转移到法国,至18世纪伏尔泰史学,法国俨然成了新中心,一个领导当时西方史学潮流的理性主义史学的“大本营”。19世纪是兰克史学及其所标榜的客观主义史学的天下,因此德国理所当然地成了西方史

^① 张广智:《苏联马克思主义史学的沉浮》,《新华文摘》2006年第21期。

学令人瞩目的“霸主”，不仅向欧洲，而且向美国，发散出它的影响。

进入 20 世纪，从表面看来，西方史学如同各路诸侯争霸，没有哪一个能称王，形成了多元化的格局。如文化形态学派显威于前（20 世纪 30 年代前后），年鉴学派称雄于后（20 世纪 60 年代前后），此后新文化史纷起、后现代主义史学挑战等（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都似乎是超越国家和地区的史学景观，但真的要问这个时代的史学的国别中心在哪里，我们以为，还是选择美国较为适宜。

说起美国史学，它其实起步很晚。正当 19 世纪欧洲史学的发展如日中天的时候，美国史学仍比较落后。历史学家赴欧，尤其是到德国兰克那里“朝圣”，是当时的一种时尚。但到了 19 世纪末，随着美国经济与政治的发展、国际地位的上升，也促进了美国史学的发展，1893 年，美国历史学家弗雷德里克·特纳（Frederick Turner）提出了“边疆论”，从此开始，现当代美国史学的发展走上了坦途。

不过，由于美利坚民族的开放性与实用性，20 世纪以来美国史学色彩斑斓，内容宏富，其发展趋势是趋向于多元的，这种形势为现当代美国史学的发展开拓了无限的空间。笔者之所以认为现当代以来西方史学的国别中心为美国，大致还基于以下一些理由：

其一，把异乡的种子移植到本土开花结果。美国史学在成长与发展进程中，处处显示出它的根在欧洲这种历史的因缘关系，欧美史学的合流，对双方来说都是“双赢”的。不过，20 世纪欧洲史学的发展得仰赖于美国，没有后者的支撑，它也许就会沦于平庸，而失去在国际史坛上的影响力。比如奥地利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运用精神分析理论的“心理史学”，只有到了美国人的埃里克森那里，才取得了长足的进步；又如，现代计量史学的“排头兵”是法国，但它只有到了美国，才在新经济史、新政治史、新社会史那里获得了全面而又充分的发展。于是，心理史学、计量史学才成为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西方史学的“亮点”。

其二，网罗世界各国之良史。在这方面，美国人也占尽了便宜。比如，二战时，不少欧洲史家亡命美国，尤其是犹太裔的欧洲史家更是栖身在那里，战后，许多欧洲史家留在了美国，举一个与我国学界接触甚多的美国史家伊格尔斯，他频繁地穿梭于中国各地，是我国史学界的常客和老朋友，他原是犹太裔德国人，二战后成了美国公民和美国历史学家。而中国之“良史”（美籍华裔历史学家），不断地从大洋彼岸传来他们的声音，他们的史识

与新见,常令国际史学界刮目相看。不过话还得说回来,大概在世界各国中,只有美国才有这样的本事把别人家的“良才”挖到他们那里去。无怪乎,美国历史协会的 15 000 名会员中,竟有 5000 余名分别来自 40 多个国家的“异乡人”。

其三,史学的国际化趋势。这一点与上述第二点有关,这里就美国史学研究的内容而言。在当今全球化时代的映照下,深刻地改变了历史学的观念,历史学的国际化就是其中的一个突出表现,这一点在 20 世纪,尤其到 20 世纪下半叶的美国史学那里,显得格外注目。在美国史家看来,“历史研究没有国界”,他们以一种比较开放的心态与宏观视野,从事跨国界的历史研究,留意从全球文明的角度来选择课题,美国史家斯塔夫里阿诺斯(L. S. Stavrianos)的《全球通史》、沃勒斯坦(Immanuel Wallerstein)的《现代世界体系》等大作都可为之作注。

第四,从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来看。

从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的特点(或走向)来讨论题旨,这应当是切中肯綮的。对此,学界从不同的方面,已作过一些论述。在诸多的论见中,我们以为历史学家罗荣渠在 20 世纪 80 年代对美国新史学的发展及其趋势所作的分析最为精到。他提到了“四个转向”^①:(1)从传统的描述性历史转向分析性历史;(2)从注意研究个别的杰出人物转向研究普通人、社会底层、默默无闻的劳动群众;(3)从政治史和经济制度史转向新社会史、新经济史、城市和地方史以及一些被传统史学忽视的领域;(4)从研究方法上,从靠个人在文献故纸堆中的爬梳资料的手工业方式转向引用自然科学研究的计量分析方法。

以上罗荣渠所论虽是当代美国新史学,但也从总体上反映了 20 世纪尤其是下半叶以来的西方史学总体上的发展特点和趋势。罗氏所言,第一点说的是历史写作的体例,第二点说的是历史研究的对象,第三点说的是历史研究的内容,第四点说的是历史研究的方法。笔者这里再补充两点:

一是从传统的单一型的史学研究转向多学科、跨学科的研究。现当代西方史学中的多个分支学科就是由此而来的。

另一是从陈腐的以西欧中心论为指导的世界史转向从全球视界出发的全球史。这是全球化时代在历史学家治史观念中的一种深刻的反映。

^① 参见罗荣渠:《当前美国历史学的状况和动向》,《世界历史》1982 年第 5 期。

总之,以上六个“转向”反映了现当代以来西方史学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的历史进程,也从中映照出现当代世界史学的巨大变革。

二、转折：从世纪之交开始

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开始于 19 世纪末与 20 世纪初的世纪交替之际,即那时发生的新旧史学之争。这种西方史学上的衔接与传承,还得要从兰普勒希特那里开始说起。

1900 年,卡尔·兰普勒希特(Karl Lamprecht)出版了《文化史的方法论》一书,提出用一种新型的文化史写作来对人类历史进行整体性的研究,并创建所谓“新型的文化史学派”。这一大异于之前传统史学观念的历史眼光,在这世纪之交显得尤为醒目,也奏响了 20 世纪西方史学进一步发展的先声。

正是兰普勒希特,率先在德国这一传统史学最坚固的堡垒内部,向以兰克及兰克学派为代表的传统史学发起了挑战。1891 年,兰普勒希特出任莱比锡大学教授,并在同一年发表了其代表作《德意志史》(共 12 卷)的第一卷,从而在德国史学界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展开了一场关于“历史方法论”问题的激烈争论,并且迅速影响到整个西方学术界。

在《德意志史》中,兰普勒希特一改传统的以政治事件的发展作为历史线索,把德意志的历史描写成民族心理的由被束缚到自由的发展史,人们通过民族精神之种种表现,可以看到人类在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他认为决定历史进程的不是个人,而是社会所反映的集体心理等文化因素,因此历史的基本内容不应只是政治的事件和人物,从而将矛头直指向传统史学坚守的堡垒。尽管他本人的研究方法也不无缺陷,但确实动摇了 19 世纪的兰克客观主义史学的权威地位。

兰普勒希特的新型的文化史观,对欧美诸国的新史学家,如法国的亨利·贝尔、美国的鲁滨逊、比利时的亨利·皮朗等,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

1900 年前后,法国史学界对历史学的性质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年鉴学派创始人费弗尔的导师摩诺对兰克式的“科学”史学著作充满着热忱,同时对米什莱的著作也有着无限崇敬,他希望自己有一天能融两家之所长;另一位历史学家拉维塞在主编的十卷本史著中涉及地理学、文化等领域,超越了政治叙事史的范围;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对事件嗤之以鼻,他强调社会

作为一个有机体的复杂性,认为社会学要致力于研究外在于个人而又能影响和限制个人的社会事实;涂尔干的后继者经济史学家西米昂则攻击了三种他称为历史学家部落中的偶像:第一种是“政治偶像”,指历史学家的意识中充斥着政治事件、战争等;第二种是“个体偶像”,即历史学家对伟人过于重视;第三种是“时间偶像”,指历史学家在研究其对象的起源时忘记了自身的存在。所有这些思想都对年鉴学派的诞生产生了作用,而真正为年鉴学派提供土壤的是亨利·贝尔(Henri Berr)和他在1900年创办的杂志《历史综合评论》(简称《评论》)。

贝尔是一位历史学爱好者,他对史学理论有着极大的兴趣。目睹着历史学研究表现出来的狭隘性,贝尔立志要改变这种现状。1900年,他建立了“国际综合研究中心”,同时创办《评论》杂志。贝尔希望藉由他的努力增强历史学与其他学科,尤其是心理学和社会学之间的合作,从而产生可称之为历史心理学或集体心理学的学科。贝尔认为,历史心理学对于历史研究来说才是真正有意义的,而传统史学中那些靠史料堆积而成的著作将历史学家变成了历史资料的收藏家。为此,贝尔强调史学家应该具有哲学思维,对诸多的史料进行综合,将它们纳入有机的整体中,从而克服史学与其他社会科学过度专业化造成的弊端。《评论》杂志的名称就来自此意。很显然,涂尔干的理论在社会学领域的巨大成功为贝尔树立了信心,也指引了方向。费弗尔后来称《评论》是贝尔安放在传统史学阵营中的“特洛伊木马”,它最终将颠覆传统史学,同时孕育着新史学。后来的发展,果然不出费弗尔所料。

贝尔的倡议很快得到了学术界有识之士的大力支持,其中包括自然科学家,如爱因斯坦。在历史学界,一些青年史学家迅速地集结在贝尔的旗帜下,共同推动法国史学的发展。《评论》杂志为费弗尔和布洛赫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讲坛,它创刊不久,费弗尔与布洛赫便成为了杂志的主要撰稿人。在贝尔的影响下,两位史学家变得成熟起来,并逐步明确了自己的理想,最终创立了年鉴学派,引导了20世纪法国史学乃至西方史学的潮流。

新史学潮流也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激起了回响。同在欧洲出现的情况相似,在这世纪交替之际,美国史学界正逢科学史学盛行之时,不少学者对传统史学发起了挑战,在批判旧史学中提出了新观点,比如特纳、鲁滨逊、比尔德和帕林顿等,他们可以看作为20世纪初美国新史学的代表人物,这一群体的共同点是,提倡历史学的实用价值,相信历史进步主义,主张使用多种

方法研究各个方面的历史。

其中鲁滨逊(James Harvey Robinson)在1912年将他从1900年到1911年发表的8篇论文结集出版,命名为《新史学》,矛头直指传统史学,宣称“历史也需要一个革命”,吹响了美国新史学行程的集结号。

在世纪之交的1900年,对于历史学而言,还发生过一件具有标志性的事件,并对整个现当代西方史学产生过持久而深远的影响。这一年,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之后,国际历史科学大会^①在法国巴黎举行了第一届正式大会,从而成为国际史学界交流沟通的一个重要平台。尽管在成立之初,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同当年的奥运会一样只是1900年巴黎世界博览会中的一项普通的活动而已,尽管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候,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只是欧美历史学家的一言堂,尽管“历史科学”这一名称仍然保留了19世纪传统史学深刻的印记,但毋庸置疑的是,回顾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百多年的历史,确可看到现当代西方史学发展变化的轨迹。

世纪之交的上述这些事情,无一不为现当代西方史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揭示了方向,于是纵横史坛,逐一展示现当代史学在欧美各国和各个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以及晚近三四十年来新变化,色彩斑斓的史学景观就呈现在人们的面前了。

三、旨趣：学术理路与编纂构想

本节之题,并无深意,简言之,实际上是要向读者交代一下本卷的“写法”,由此或可略见我们的写作旨趣。

首先要说的是“现当代”一词,这与学术理路与编纂构想都有关。

^① 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是全世界历史科学工作者组成的国际学术组织。它的特点：一是广泛性，目前已有80多个国家和史学研究机构加入；二是权威性，每5年召开的国际历史科学大会既是对以往史学研究成果的一次总结，也对世界历史科学的发展具有导向作用；三是综合性，它设立的历史学的分委员会涵盖了历史学的各个分支学科。1898年，国际历史科学第一次大会在荷兰海牙举行。以后，大体上每5年召开一次大会，迄今为止已举行了19届，1980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举行第15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中国以观察员的身份列席会议。1985年中国史学会被正式接纳为国际历史科学委员会成员，并参加了1985年8月在联邦德国斯图加特举行的第16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以后各届都组团参加。第17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90年8月在西班牙马德里举行，第18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1995年8月在加拿大蒙特利尔举行，第19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2000年8月在挪威奥斯陆举行。第20届、21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分别于2005年7月与2010年8月在澳大利亚悉尼与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

“现当代”一词,作为一个时段符号,屡屡见之于政治编年史上,就像“近现代”一词一样。“现当代”,即“现代”与“当代”的组合,按当今中国史学界通常的说法,往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的1945年,作为划分现代与当代世界历史的分界线,称1900年以来至二战结束为世界现代史,1945年二战结束迄今为世界当代史。不过,大凡20世纪发生的事,还可以笼统地称之为“现当代”,我们在写作本书时,也往往把这两者混同使用,不再细分。

须知,对“现代”也好,“当代”也好,还是“现当代”也罢,其界限的确定,都不可能像数学上的一条切线那么精确,其概念的内涵或外延,很难有统一明确的含义。就说“当代”一词的含义,据巴勒克拉夫说,自1918年以来,曾有过长期的争论,各家对此均有不同的界定和理解,在现代与当代之间,也不存在什么确切的界线^①。

至于说到史学史的分期,虽然可以借用政治编年史上的时段符号,但却要考虑史学自身发展的情况,在很大程度上,史学的变化或转折,相对于社会 and 时代激烈变动时的迅猛,总是滞后的。比如“现代”、“当代”或“现当代”的西方史学的分期,当不可能也不必与人们头脑中的政治编年史概念完全吻合。在我们看来,“现代”(或更宽泛的意义上的“现当代”)西方史学,当始于前述世纪末的新旧史学之争时。1955年,即20世纪50年代中叶,因为西方史学开始了又一次新的“重新定向”,于是就显露出了当代史学的症候。在现代西方史学与当代西方史学之间,也不存在一条明确的分界线。因此,本卷无论是上半部分的“国别编”还是下半部分的“专题编”,都不会以“现代”或“当代”作随意的切割。以法国年鉴学派为例,给它戴“现代”或“当代”的帽子,都不合适,还是笼统地称它为现当代的法国史学派别吧;又如全球史的理论与实践,又岂可以“现代”与“当代”作出任意的界定。由此可以看出,我们在写作本卷时,十分注重文脉的连接与传承,而不会生硬地给它贴上一个时段符号,这或许就是一种“学术理路”吧。

关于本卷的内容,从时间上来说,大体叙述从19世纪末至今,约百多年的西方史学的历史行程。从空间上来说,本卷所涉及的地理范围是欧美地区,包括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的现当代史学的发展情况,以及一个多世纪来西方史学几个令人注目的侧面。导论以概括的语言,叙述西方史学从传统史

^① 参见杰弗里·巴勒克拉夫:《当代史导论》,张广勇、张宇宏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6年版,第1章。

学走向新史学的时间流程,让读者对现当代西方史学的情况,先有一个最基本的线索。其下分为两编,上编名为“欧美新格局”,说及西方几个主要国家现当代史学的概况。在次序上,法国先行,美国殿后,这是符合它们史学发展的实际情况的。下编名为“史林新面貌”,逐一论述文化史观、新领域与新方法、重构世界史、历史哲学,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开始,即晚近三四十年以来西方史学的新变化。末章“20世纪中外史学交流”也归入该编,旨在为西方史学史内涵的深化作一点探索。另有一个简短的结语。

我们深知,现当代西方史学内容宏富,为知识领域所限,本卷尚有不少的内容未被涉及,或是一笔带过,此乃非不为也,乃不能也。当然落墨之轻重,选择之有无,也反映了著者的思想。正如现代比利时历史学家亨利·皮朗所言:“某些遗漏是出于我的无知,另一些是由于一切书目提要都必不可免地要反映出编者的偏好。”^①编“书目提要”是这样,遑论历史学家的著作。可见,兰克所标榜的“无色彩的历史”,当是虚言。

关于本卷之编纂,还需要说到的一点是,我们采分国叙述与专题研究相结合的方式,国别部分亦有专题介绍,专题部分中也考虑国别,两部分相互照应,钩贯隐通,互补益彰。对于重大史家或流派,为“服务”于某一章节,就可能出现多次,但各有侧重,比如兰普勒希特。事实上,本卷之体例与写法,已有名家(如古奇写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先行,也有我们自身的实践(如张广智、张广勇合著的《现代西方史学》),这种史学史的写法,也可能易于为读者所接受,因为眉目清晰,比较好读。

以上这些,就是我们要向广大读者约略说明的本卷之“写法”吧。

① 亨利·皮朗:《中世纪欧洲经济社会史》英译本序言,乐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页。

目 录

导论	1
一、流程：从传统史学走向新史学	1
二、转折：从世纪之交开始	7
三、旨趣：学术理路与编纂构想	9

上编 欧美新格局

第一章 法国史学	15
一、年鉴学派	16
二、拉布卢斯学派	45
三、马迪厄学派	47
四、勒努万学派	51

第二章 英国史学	55
一、党同伐异的学派纷争	55
二、对历史学自身发展进程的思考	61
三、史学研究的新方向	68
四、马克思主义史学派	72

第三章 德国史学	80
一、传统史学的坚韧性	80
二、现当代历史主义的代言人	85
三、从保守派到新自由派	89
四、“费舍尔大辩论”	94
五、史学变革的新方向	96

第四章 意大利、荷兰和比利时史学	102
一、意大利史学	102
二、荷兰史学	107
三、比利时史学	114

第五章 美国史学	117
一、历史学新潮流	117
二、新大陆的烙印	126
三、新的研究取向	134
四、社会科学新史学派	143
五、新的发展趋势	153

下编 史林新面貌

第六章 文化史观	161
一、近代的遗产	161
二、20 世纪的最初进展	163
三、斯宾格勒：文化形态学派的创立	166
四、汤因比：文化形态学派的发展	172
五、衔接与传承	178

第七章 新领域与新方法	187
一、心理史学	187
二、口述史学	194
三、计量史学	200
四、影视史学	212

第八章 重构世界史	218
一、历史观念的变动	218
二、宏观的世界史新学派	223

三、世界通史体系的重建	231
四、全球史：东西方视野下的交错	236
第九章 历史哲学	242
一、批判的历史哲学	242
二、分析的历史哲学	253
三、存在主义历史哲学	265
四、结构主义历史哲学	269
第十章 西方史学新变化	275
一、叙事史复兴与对“新史学”的反叛	275
二、新的盟友	280
三、微观史学	284
四、新文化史	298
五、后现代的挑战与历史学	319
第十一章 20 世纪中外史学交流	323
一、中外史学交流与 20 世纪中国史学	323
二、中外史学交流与史学史研究	328
三、中外史学交流与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建设	330
结语	333
参考书目	337
后记	347